

瞭望驿站

文·陈琛

毫无疑问,美国资本市场对于科技初创公司(Startup)的投资泡沫一直是业内津津乐道的话题,人人谈泡沫,但是此前并没有出现明确的证据证明泡沫开始爆破,而近期,该证据竟然戏剧性的出现了。

专注于初创公司数据研究的专业机构Mattermark近日在一份分析报告中指出,2014年第四季度全美初创公司投资交易量已经跌至2011年水平,尤其是种子轮的投资下降趋势明显。业内分析人士指出,这表面对初创公

硅谷种子轮投资呈下降趋势

司投融资泡沫,美国本土投资人率先恢复理性,2015年美国初创公司早期投资将进入调整期。

近日,初创公司数据研究机构Mattermark首次披露了美国本土初创公司投资泡沫出现拐点的一系列证据,2014年年末,十几个大的投资交易推高了过去三个季度投向初创公司的资金总额,据悉,年末共有11个初创公司完成了12个1亿美元以上的融资,融资总额达到40亿美元。但是,2014年下半年,美国初创公

司投资的整体交易量大幅下降,已经跌回到了2011年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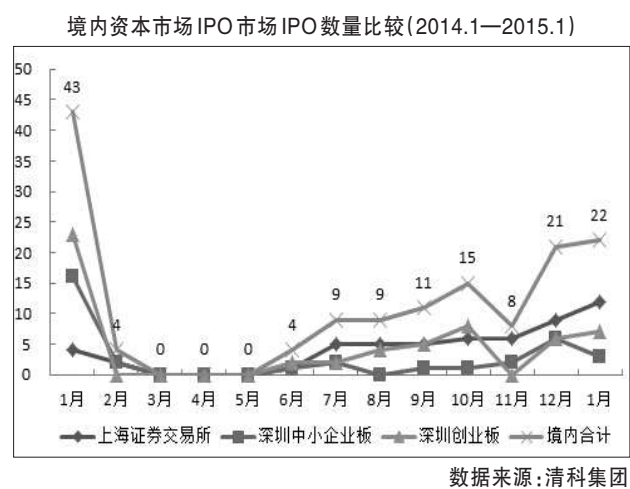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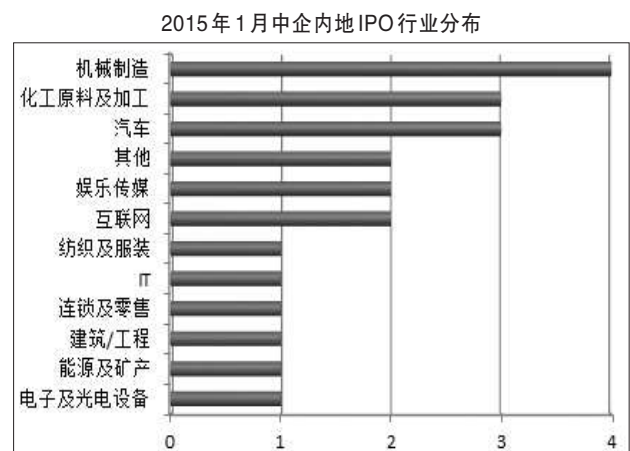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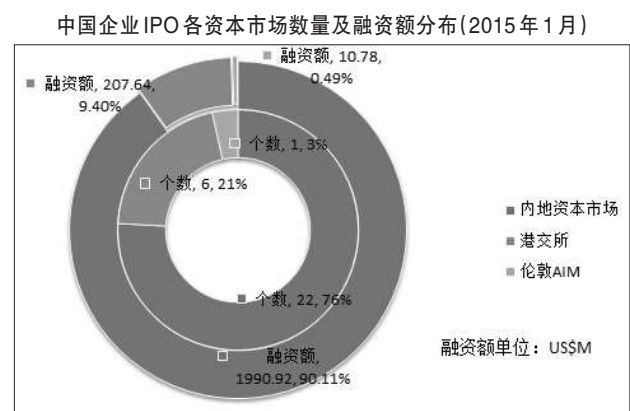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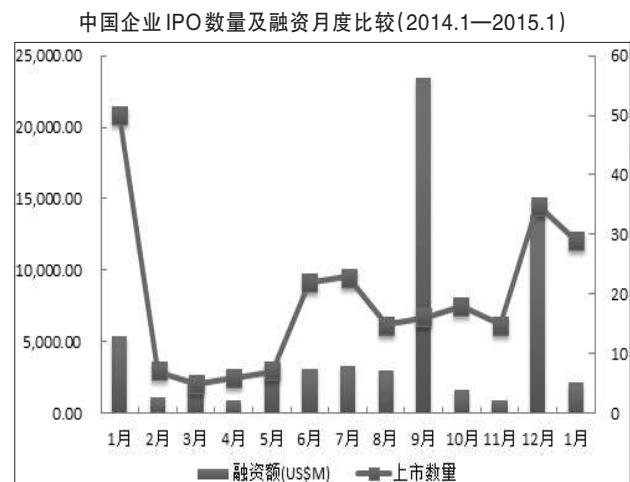
对初创公司的投资一般分为种子、天使、A、B、C、D轮等,当我们把每一轮融资的交易量单独拿出来生成曲线图时,可以看到,2014年种子轮的投资交易量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降。

种子轮投资出现急剧下降的原因或许与目前金额稍大的种子轮往往倾向于并入天使轮、A轮有关,但更大的原因或许是种子轮投资正同其他轮融资(天使、A、B、C、D轮)同步

萎缩。2014年美国天使轮融资平台AngelList的相关数据可以证明这一观点,2014年8月开始,AngelList平台的融资交易量也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这与种子轮融资的下降趋势相互呼应。

硅谷一线早期项目投融资平台F50创始人David Cao表示:“这是一个清晰的转折点,表明美国本土投资人开始趋于理性,2015年这一趋势还将延续,美国初创公司创投泡沫将进入一个调整期。”

图说市场



商业健康保险来了

文·本报记者 姜晨怡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和部门协同,鼓励商业健康保险机构以出资新建等方式新办医疗机构等健康服务机构,完善健康保险有关税收政策,鼓励社会资本投资设立专业健康保险公司,营造

良好社会氛围,为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提供完善的政策支持。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市场体系完备、产品形态丰富、经营诚信规范的现代健康保险服务业。为何要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将给行业现状带来哪些改观?

规模仍然较小 完善医疗服务体系是关键

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在健康保险领域做了不少尝试。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家保险公司开展商业健康保险业务,备案销售的健康保险产品达2200多款。2009年至今,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累计支付赔款超过2100亿元。

即使如此,我国的健康保险规模仍然较小。从保费数据看,与健康保险自身发展比,健康保险在总保费中占比仅为8%,占人身保费收入的12%。以美国为例,美国健康保险保费收入达到8500亿美元,占保险业保费收入的40%。健康人均保费仍然较低。我国健康保险的人均保费为116元,美国和德国2013年的数据分别为美国16800元,德国3071元。在医疗卫生总费用中的占比,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较低。我国商业健康保险赔付支出在医疗卫生总费用中占比为1.3%,而德国、加拿大、法国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10%以上,美国高达37%。也就是说美国的整个全社会医疗费用总支出里,37%是来自商业健康保险。

“2014年,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达到1587亿元,同比增长41%,这是一个非常快的增长速度。”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黄洪介绍,目前,全国有100余家保险公司开展商业健康保险业务,产品有2300多个。产品涵盖医疗保险、疾病保险、护理保险和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即使如此,我国对商业健康保险的需求仍然十分迫切。

根据《意见》要求,未来我国将大力发展与基本医疗保险有机衔接的商业健康保险。鼓励企业和个人通过参加商业保险及多种形式的补充保险解决基本医保之外的需求。对于人们普遍关注的大病险,《意见》表示,从城镇居民医保基金、新农合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或额度作为大病保险资金,在全国推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遵循收支平衡、保本微利的原则,全面推进商业健康保险受托承办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提高大病保险的运行效率、服务水平和质量。

缓解医疗费用上涨 增加医疗服务资源

“从国际来看,由于经济发展和医疗技术进步等原因,特别是人们对健康追求的无限性,医疗费用呈长期‘刚性’上涨的特点,单靠政府财政支出难以应对。”黄洪介绍,商业健康保险是一种市场化的医疗筹资机制,可以调动政府、企业、个人等社会资源参与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有利于形成稳定、多样化的筹资来源。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可以降低财政医保支出的压力,增加经济增长的动力,实现医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商业健康保险可以投资医疗服务,增加医疗服务资源。目前,我国人均拥有的医疗资源还比较缺乏,千人床位仅4.55张,欧洲为10张,日本为15张,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所以在很多医院出现这样的现象,即住院一床难求,门诊排队长。“过去我们在医疗资源供给上主要靠政府,但是解决医疗资源不足不能完全靠政府来投,完全靠政府是难以继的,因为

经济增长是有限的,对健康追求是无限的。”黄洪这样说。

在发挥商业健康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方面,《意见》表示,应鼓励商业保险机构遵循依法、稳健、安全原则,以出资新建等方式新办医疗、社区养老、健康体检等服务机构,承接商业健康保险有关服务。各地区要统筹健康服务业发展需要,加强对具有社会公益性的商业健康保险用地保障工作。

“目前保险业从人身保险业来看,现在汇集的资金超过8万亿元,只要拿出其中一部分来投资医疗机构,这就可以有效地增加医疗服务资源。而且保险公司投资医疗机构有强烈的意愿,为什么有强烈意愿?就是它的资金与医疗经营特点相匹配、相适应。”黄洪介绍,商业健康保险发展不仅仅可以降低个人的医疗费用支出,降低财政支出,还可以参与管控医疗风险,还可以参与医疗资源的供给。

年轻人要提前做商业养老财务规划

面对老龄化问题带来的种种挑战,商业健康保险也被寄予厚望。“老年人可以用他们的退休金的一部分购买一个商业保险,商业保险公司可以为他提供医疗费用报销,保障水平是他购买的几倍。”黄洪这样说。

到目前为止,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达到2.12亿,占总人口的16%。按照国际标准,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根据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总调查数据,我国老年人口的两周患病率为46.6%,远高于全国18.9%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全国人口两周患病率是18.9%,而老年人口两周患病率为46.6%,这直接导致老年人口的医疗费用急剧上升。

据全国居家养老状况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十个大城市被调查者及配偶的支出中,医疗费用是除基本生活费外最大的支出,月均支出1039.8元,占家庭总支出的1/4。

“老了,生病发生几率高,医疗费用负担重,这就需要我们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尽早引导居民做出更科学合理的医疗财务规划,拓宽全社会健康保障资金来源,形成政府、社会以及个人

共担健康医疗风险的格局。”黄洪称,这成为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期内化解社会健康风险的必然战略选择。

老龄化的趋势成为必然,因此黄洪建议,从现在开始就要对自己未来健康保障做出一个合理的财务规划。

“有些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很好,客户却会对我们说,我有了社会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不需要买保险,或者是觉得如果把买保险的人用来投资,则能够赢得更多收益。”北京信诚人寿的销售经理任女士表示,事实上,虽然商业保险公司会从保险中获得收益,但没有什么是可以保证身体一直没问题的,也没有人敢说自己的养老钱和看病钱一定够花。

“也就是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就要适当的购买一定比例的商业健康保险。等自己进入老年以后,随着身体自然衰老的过程,生病发生率就高了,医疗费用负担就大了,那个时候有一个商业健康保险,自付医疗费用比例可以大大降低。”黄洪建议,现在年轻人应该提前做好自己未来的商业养老财务规划。

国际经验

以税收优惠激励商业健康保险发展

从国际经验看,税收优惠是鼓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最有效的政策杠杆之一。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主要发达国家对企业和个人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均有财税优惠政策。美国对企业为员工、公民个人和自由职业者为自己购买健康保险免税。新加坡政府规定,雇主和雇员向公积金账户的缴费和利息均不必纳税,并且在所有者去世后,账户余额以遗产的方式给继承人,不缴遗产税。同时,新加坡政府还规定雇主向雇员提供的补充医疗保险可以享受每年最高2%工资总额的税收减免。

澳大利亚实行“商业健康保险激励计划”和“终身商业健康保险计划”,为购买商业健康保

险的客户给予保费补贴和税收优惠,同时对未按规定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人加征附加保费。这些优惠政策对于促进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完善医疗保障体系有重要作用。如美国,1952年,美国只有63%的员工享受健康保险保障,1954年,《税法》明确了团体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政策,到了1957年,拥有健康保险保障的美国员工比例提高到了76%。又如澳大利亚,1999年,澳大利亚参加商业健康保险的人群不足600万人,而到2013年9月底,澳大利亚共有1093万人参加了商业健康保险,占总人口的47%。可见税收政策对商业健康保险的撬动作用是很明显的。

金融创新

把有限的资金和政策用到战略性科技创新领域

2015年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在湖南长沙召开,主办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会上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动力、风险。作为中央决策服务的高端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此次全国性会议也是观察中国经济运行和宏观政策“风向”的窗口。中国经济巨轮向何处去?当前,中国经济运行趋势如何?面临哪些机遇?需防范哪些风险?

新常态蕴藏新机遇

当前,我国正步入经济新常态。李伟说,伴随着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原有的风险化解机制难以适应经济运行的需要,而经济发展方式和市场主体的行为则很难及时调整,被掩盖的矛盾和风险就会逐步显露。

祸兮福之所倚,“新常态同样蕴藏新机遇。”在李伟看来,经济结构调整难免阵痛,但调整成功将会提升资产质量和产业结构,并创造新的工作岗位;一些传统产业需求虽然饱和了,但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需求正在涌现,供给创

造需求的空间无限巨大。

此外,出口增长虽放缓,但利用装备能力、产业配套能力和资金输出等优势,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有望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保护环境、治理污染会增加成本,但提供生态产品,走低碳、绿色发展道路,则会带来新商机。

“我国人均GDP按人民币与美元汇率计算仅相当于美国的八分之一,居民最终消费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农业劳动力占比等指标,与美国相比均有相当大的差距,国内市场扩张、服务业加快发展、城镇化快速推进等都具有广阔的空间。”李伟说。

培育新动力重在科技创新

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换挡与调整,但本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与接续。

“培育增长新动力的关键在于创新。”李伟说,除了要进行产品创新、生产组织方式创新和工艺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外,最重要的是要进行科技创新。

李伟援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数据说,2013年,中国专利申请总量接近美日两国的总和,但我国的创新层次较低,在被授权的专利中,发明专利不足1/6。

他说,在数字机器人、分布式能源、智能电网、物联网、新材料等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大体上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有机会走在创新前列,甚至走在创新最前沿。应统筹配置创新资源,力争在这些新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正像树木生长离不开阳光雨露一样,创新也需要适宜的生态环境。”李伟说,构建良好的创新环境,首先要正确处理政府、大学、研发机构和企业四者之间的关系;其次要完善国家创新政策体系,把国家有限的政策和资金资源,集中用到决定长远发展前景的战略性科技创新领域。

需防范四方面风险

李伟认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需防范和化解四方面风险:——财政风险。2015年,房地产市场阶段性调

整带来的土地收入缩减,地方债务偿还相对集中,过剩产能逐步退出,以及维持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等,都会加剧财政压力,特别是地方基层财政压力。

——金融风险。包括防范地方金融机构风险,以及政府债务的化解。此外,要重视企业效益下降、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以及互保联保问题。

——房地产市场风险。房地产市场总体下行趋势仍将继续,去库存任务依然艰巨,市场分化趋势加剧。同时,一些房地产企业扩张过快,市场销售不畅,融资能力不足,抗风险能力较弱,违约、资金链断裂等经营风险明显上升。

——就业风险。新常态下,就业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一是经济结构调整,部分传统过剩产业面临淘汰和转产,不少职工难免失业或转岗,因技能短期不适应新岗位、新业态需求,摩擦性失业会有所增加;二是由于与产业升级、岗位需求不匹配问题突出,大学生就业压力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此外,由于二代农民工就业形态和报酬要求发生了明显变化,原有的土地对就业波动的缓冲作用明显降低。(据新华社)

资本市场

2014年人民币对外币直接交易成交10482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公布的《2014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2014年人民币已实现与8种货币在双方银行间外汇市场直接交易,人民币对外币直接交易共成交10482亿元,人民币直接交易的好处正逐步显现。

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货币汇率波动加大,一些新兴市场的微观经济主体出于节约汇兑成本考虑,对人民币与新兴市场货币兑换交易的需求上升。

央行表示,自2009年跨境人民币业务试点以来,人民币直接交易货币顺应市场需求从最初的林吉特、卢布等周边国家货币扩展到了欧元、英镑、日元等主要储备货币以及澳大利亚元、新西兰元、新加坡元等可兑换货币,初步形成人民币直接交易网络,这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是相适应的。

央行报告显示,人民币对外币直接交易日益活跃,成交快速增长。2014年,人民币对外币直接交易共成交10482亿元,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即期交易中占比为4.7%,而2010年前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成交量占比不到0.5%;人民币直接交易日均成交102.22亿元,与前一相比提升了8.4倍。